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

两汉儒生的社会角色

**The Confucian Scholars'
Social Activities in Han Dynasty**

禹 平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

两汉儒生的社会角色

The Confucian Scholars'
Social Activities in Han Dynasty

禹 平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汉儒生的社会角色 / 禹平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2989 - 2

I. ①两… II. ①禹… III. ①知识分子 - 研究 - 中国 - 汉代
②社会生活 - 史料 - 中国 - 汉代 IV. ①D691.71②D6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2403 号

·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 ·

两汉儒生的社会角色

著 者 / 禹 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26 责任编辑 / 许秀江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责任校对 / 刘伟雷

项目统筹 / 恽 薇 陶 璇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75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 / 333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989 - 2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一 汉代儒生问题研究的意义与学术价值

本书把汉代的儒生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兼具文化价值及学术意义。

一般认为，“儒生”意同“儒士”，是“信奉孔子学说的人”。^①同时，儒生也是一个群体名词，指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以儒学为知识背景，有着“效法孔子、祖述周公”的理想追求的儒家学人所构成的社会知识群体。他们以儒家经典为研习对象，知识结构以儒学为主，并主张以儒家的理念改造社会、服务现实政治。本书就是在上述意义上，对汉代的儒生问题加以探讨的。

在两汉时代，儒生是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汉武帝定儒学为一尊之后，儒生更进而成为这一阶层的主干。儒生出仕入教，在汉代社会政治、文化甚至经济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西汉以降，儒学被定于一尊，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学校教育、伦理道德甚至官吏的选拔都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儒学及其所承载的儒家思想不仅是维护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而且它在国家的政治运作以及民众的日常伦理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指导角色。如此一来，研习和掌握儒学知识的儒生不仅在上层社会具有关键性影响，而且在地方乡民社会中也还是贤达人士，扮演着权威的角色。他们不仅参与国家日常政治运作，而且在地方社会当中，他们的活动同样也影响到地方社会的演进和变迁。

儒学不仅仅是中国的特色文化，在东亚社会的历史文化中也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影响的扩大，儒学也日益国际化，为世

^① 《辞源》修订版“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第143页。

界各国所关注。因此，加强对儒学及相关的儒生等问题的梳理与阐释，对推动儒学的国际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仅如此，由于儒生作为儒学的传承者和儒家理想的实践者，在古代社会扮演着官员、学者、乡绅等多种角色，不同时期所发挥的社会作用也不尽相同。两汉时代，正是儒学上升为“官学”的初期，儒者的社会角色经历了初步的转换和定位。因此，深化对儒生群体的研究，也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的。

二 汉代儒生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儒生问题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研究课题，不仅从事文史哲研究的人文科学学者加以关注，而且从事社会学、教育学、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学者对这一领域也多有涉及，因此不仅探讨的范围十分广泛，而且迄今已经积累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厚。从本书研究的角度看，已有的成果可归纳为以汉代儒生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两汉个体儒生的个案研究和其他相关研究三种类型。其中，后两种类型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以汉代儒生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成果相对较少，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为数更少，主要有以下几部。

东汉学者王充的《论衡》一书，是讨论汉代儒生群体特点的较早著作。在该书的《儒效篇》、《儒行篇》、《量知篇》、《程才篇》、《效力篇》和《别通篇》等篇章中，王充对儒生的类别、儒生的特长及儒生的社会表现等诸多方面都有论及，阐发对儒生反省、定位的一己之见，对于儒生文化创造意识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堪称古代学者在汉代儒生研究中最有建树的。^①应该说，这同样是身处汉代的王充对其所处社会的儒生的种种问题的切身观察和思考。

顾颉刚先生的《秦汉方士与儒生》，在1935年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时原题为《汉代学术史略》，1955年上海联群出版社重版时改名为《秦汉方士与儒生》。此书的主旨是说明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在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怎样运用阴阳五行的思想创立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来为秦汉时期各历史阶段的统治集团服务的，意在用来阐发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②

① 黄宛峰：《论王充的儒生观》，《齐鲁学刊》2004年第2期。

② 王煦华：《〈秦汉方士与儒生〉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2~13页。

在该书中，顾颉刚先生谈及了西汉时期儒生与方士的合流、儒生的政治、学术活动等汉代儒生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关于该书的学术倾向，顾先生在1954年所写的再版序言中说：“那时的我虽已知道应当从社会背景去解决问题，但因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从两汉社会的经济基础来分析当时政治制度与学术思想，这是违背历史唯物论的，是本书的根本缺点。”^① 顾先生的这一自伐，反映了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研究的理论自觉，但今天看来，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所共有的理论认识局限性也再所难免。当然，该书是以汉代儒生的政治活动以及政治思想为主要考察对象，因而对于汉代儒生的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考察就难免缺乏。

余全介先生的《秦汉政治与儒生》（2005年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从历史研究的动态视角，对秦至西汉两百年间儒学的发展进行了系统梳理，着重从政治与学术思想关系的角度，考察儒学从受打击的“低谷”到独尊的“巅峰”的曲折发展历程，详密考察了作为儒学载体的“儒生”在不同时期的遭遇和命运，特别深入细腻地揭示出儒学从汉初到武、昭、宣直至元、成帝各个时期的不同变化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多有新的开拓和发现。与顾颉刚先生的论述相比，余氏对汉代儒生的政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的探讨显然要超出前者，但是，余氏的论述同样也是基于政治角度的考量。

刘修明先生的《儒生与国运》，是一部专门探讨中国古代儒生与政治的通史专著，在该书第二章，作者从秦汉历史转折中的儒生及其作用、汉帝国上层建筑的建构、博士制度和儒相参政、党锢之祸和太学生、张衡与桓谭：独立意识和依附身份等方面，对汉代儒生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于迎春先生《秦汉士史》^②一书，以秦汉时期的政治发展为背景，对处身其中的士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转变、政治思想的变迁以及士人与国家政治关系的演进都进行了颇为细致的梳理。比起其他一些论述，于先生的考察涉及秦汉士人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活动的诸多方面，应该说对这一时期儒生群体的研究是较为周详的。

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对汉代儒生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他的《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以及《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① 顾颉刚：《秦汉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8页。

② 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两篇文章之中。一方面，他考察了儒生作为掌握儒家礼乐文化的政府官员，是如何在日常的行政当中——尤其是作为地方行政官员——向民众传播儒家的文化传统和思想理念，从而使儒家的文化传统、国家的统治和地方民众服从统治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余先生也考察了士人在东汉政权的建立过程中的社会政治活动，他认为这些活动不仅影响到东汉政权的建立，同时也影响到东汉政权的权力结构和士族政治的发展。^①

此外，葛承雍先生的《儒生·儒臣·儒君》，从儒生群体的社会地位等方面，对秦汉儒生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有关两汉儒生的探讨，与本书关联度比较大的，除了对儒生社会活动的具体阐释外，主要是儒生的社会属性、儒生与文吏的关系等问题。

1. 关于儒生群体的社会属性

“儒生”一词具有两重性，既可以用来指称个体儒生，也可以指代群体儒生。群体儒生的存在，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客观事实。不过，学者们在对群体儒生社会属性的定性描述上却不尽相同。众所周知，两汉是一个文明发展与社会结构都纷繁复杂的时代，社会上存在着皇帝、官僚、一般民众乃至奴婢等不同等级和身份的人，因此这种等级、阶级或阶层上的社会差别的存在，也是包括汉代在内的中国古代王朝社会的一个特点。近代以来，对于群体儒生的社会属性，学者多从阶级分析或社会分层等不同角度加以阐释。

瞿同祖先生《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以身份、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为维度，对汉代社会进行了分层。他将汉代的社会成员按照从高到低的次序，分为皇室与王室、贵族、官员、宦官、平民、客、奴婢等阶级。其中，平民阶级有士、农、工、商四类人，儒生被其归为士类之中。

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及之前所著的《中国知识阶层史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引用知识阶层的概念，从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上，对古代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他认为士在先秦时期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秦汉时代，士的活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两个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129~286页。

方面。也就是说，他认为儒生在汉代是士阶层的主干，在定性上属于古代知识分子。

杜维明先生《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不仅将儒生视为知识分子，更是将其定称为“儒家知识分子”。杜先生认为：“儒家学者在公众形象和自我定位上兼具教士功能和哲学家作用，迫使我们认为他们不仅是文人，而且还是知识分子。”^①

葛荃先生《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秉承刘泽华先生从政治文化审视传统社会的学术视角，对中国古代士人的特征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士人是中国古代才有的一种特殊身份，是一个历史概念，尽管在精神的表层，以及思想行为的表象上与现代知识分子确有“相近”之处，但是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从战国时代开始，士从一个等级逐渐变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位于君主集团与一般民众的中间地带，是属于社会下层和统治阶级上层中间的一个社会阶层。从葛荃先生在书中对士人所下的“士人指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读书人，他们以研习儒学经典为手段，以参与政治为最佳生活选择，以道德修习和实现‘内圣外王’理想为最佳人生设计，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载体，他们以学习和传播儒学知识作为自己的基本生存方式”的定义看，^②他对士人特征的描述，绝大部分都与儒生相符合。因此，将如上观点视为其对儒生社会定位的看法也许并无不妥。

干春松先生《制度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对儒生的社会角色和自我定位问题进行了专章探讨。他和葛荃先生一样，对于余英时和杜维明先生等海外学者将儒生（或士）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将儒生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相提并论是‘美化’了儒生”。^③“如果我们只用近代西方的知识分子形象来规范儒生的社会形象时，其实质就是要求以一种独立和现存秩序的批评者的角色来衡量传统社会中的儒生，这就意味着，会有许多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被排除儒家的行列，有些甚至被视为儒门的耻辱。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

① 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1页。

② 葛荃：《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第15页。

③ 干春松：《制度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71页。

的。”^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从实际的儒家生态来看，儒生的角色是多样化的。他们既是‘师’，又是‘臣’，有时甚至是‘方士’。正是因为儒生具有精通礼仪和古代制度的特长，因此无论是自身的取向还是现实的政治需求都导致儒家和政治体系之间的结合。儒家之所以被确定为国家意志的代言者，是权力的需要和儒家的追求之间结合的产物。……因此我们说儒生的最主要角色是政治性的，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也体现在政治观念和社会秩序的建设上。”^②

旅美台湾学者陈启云先生《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着眼于思想文化层面的意义阐释汉代儒生的社会属性。他认为“阶层”是超乎经济利益和权力实体的社会功能的组合，“阶级”是基于经济利益和权力结合的实体结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不赞同余英时先生将儒士看成具有特殊阶级含义的“知识阶层”的观点，认为“在余氏心中，其具有特殊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形态’则与马克思的‘阶级’相近，这是不正确的”。^③他认为，“士为四民之首，原因是农工商都是经济利益（生产力）的实体，士则是功能性阶层；其功能不在维护本身或本阶层的经济利益，而在其能超越本身或本阶层的经济利益来整合调度各种不同的经济（生产力）实体（农工商）的利益；这不是一种经济（生产力）实体，而是一种社会文化功能；维持这种功能的是在社会文化中约定成俗的理念，并由此社会文化力量巩固为一种道义，提升为一种理想；一旦其违反了这种道义、丧失了这种理想，便会失去了这种功能，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儒、士的道义理念和理想是研究汉儒的首要论旨。”^④

刘绪贻先生《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认为儒生与皇室，是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两个阶层，从西汉时起，儒学统治具有深厚的既得利益，是抵制中国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刘先生在书中一方面将儒生视为社会阶层，同时，也将工商业者、医者与方士等科技工作者和游侠称为社

① 干春松：《制度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73页。

② 干春松：《制度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76~77页。

③ 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42页。

④ 陈启云：《中国中古士族政治考论之一（渊源论）》，《新亚学报》，第十二卷（1977）；引自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43页。

会群体。足见他并没有将这两个概念作严格区分，而是作为相同概念使用的。在这一点上，刘绪贻先生的用法并不是孤立的个案，如陈咏明^①、余英时^②、阎步克^③等学者对这两个概念也是交互使用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古代社会不具有像近现代社会这样的严格进行社会分群与社会分层的客观条件，并不是学者的疏忽。对于汉代儒生，我们将其视为一个社会群体也好，将其视为社会阶层也好，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他们具有较多的共性。根据以上学者的看法，结合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将儒生视为一个知识群体，这是他们文化上的共性。儒生往往又是统治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与政治的关系较之其他一些社会阶层或群体要更为密切。

2. 关于儒生与文吏的关系

两汉时代，从武帝时起，经术成为儒生仕进的制度化途径，走上仕途的儒生（即儒吏）与文吏相伍构成汉帝国官僚阶层的主干。由此，文吏成为与儒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群体。

在汉代，文吏有两重含义：一是“武吏”的对称，在这一意义上，文吏也包含儒生在内；^④二是儒生（儒吏）的对称，在这一意义上，如果不考虑其褒贬的蕴意，文吏与文法吏、文史法律之吏、刀笔吏、俗吏基本是同一个意思。实际上，文吏是出于官僚体系的基层序列的官吏，他们虽然接受了相关的文化和行政技能的培训，但在文化素养和思想意识尤其是对儒学的掌握等方面则处于较低层次。文吏主要负责各种具体的行政事务，其升迁途径也较受限制。^⑤阎步克先生在这一意义上概括文吏的特征道：

他们经专门培训而具备了基本行政技能，依照能力、功绩和年劳

① 陈咏明：《儒学与中国宗教传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第102~103页。

② 见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与《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3~76、251~256页。

③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页。

④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5页。另外，班固在《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中说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这一与功臣相对应的文吏概念，就是从文武之文着眼的。

⑤ 新出简牍为探讨汉代文吏提供了不错的素材，具体的论述可参见黄留珠《简牍所见秦汉文吏的若干问题》，收入所著《秦汉历史文化论稿》，三秦出版社，2002，第274~288页；于振波：《从尹湾汉简看两汉文吏》，《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任职升迁，并严格地遵循法律规章和充分地利用文书簿记进行工作。^①

对于汉代儒生与文吏的关系问题，西汉以来学者多有探讨。如西汉昭宣时期的儒生王吉，就从儒家以礼施政的角度，阐述了文法俗吏施政治民所致的“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伪萌生，刑罚亡极，质朴日销，恩爱寝薄”的弊端。^②显然，王吉对文吏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文吏的施政更偏向于法家的理念，其行为更多功利色彩，文吏行政给社会风俗、国家行政带来的只是消极的影响，这与儒家的政治治理观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王吉对文吏的批评态度为后来之学者所承继。东汉学者王充，在所著《论衡》一书的《程才篇》、《量知篇》、《谢短篇》及《效力篇》中，对儒生与文吏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如他认为“儒生不习于职，长于匡救；将相倾侧，谏难不惧。案世间能建蹇蹇之节，成三谏之议，令将检身自救，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世之将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③“儒生修大道”，“文吏晓簿书”。^④两者各有所长，徐复观先生认为王充《论衡》书中关于儒生与文吏优劣长短的这些阐述，除了为表彰自己外，也反映了汉代儒生与文吏在地方政治中的对立。^⑤王吉与王充的评论当可代表汉代儒生对自身与文吏的看法。儒生是风俗气节、政治道德的践履者和维护者，文吏则只是具体行政事务的执行者；儒生对权力的掌控则会实现政治的良性发展，而文吏因为缺少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他们虽然能长于事用，但不加节制则会导致行政紊乱。王吉与王充自然是对儒生持肯定态度的。

现代学者对两汉儒生与文吏两者关系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阎步克先生的研究。阎步克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的考察角度，对儒生与文吏两者关系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细致考索，不仅发表了10余篇相关论文，而且还形成了《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书。阎步克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先秦士人与

①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7页。

② 《汉书·王吉传》。

③ 《论衡·程才篇》。

④ 《论衡·谢短篇》。

⑤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355页。

文吏分化为两种类型的角色和群体，各有不同政治取向；秦任文吏，汉廷对文吏儒生兼收并用；汉代儒生与文吏相互冲突，形成了党派政争；这种冲突，与儒法两派的理论对立，密切相关；冲突中又发生了儒生的文吏化和文吏的儒生化，东汉二者趋于融合；这种对立和融合影响到了政治制度，如选官制度的变迁。^① 结合历史事实，我们认为阎步克先生的分析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汉代儒生和文吏之间的身份关系的变迁。这种变迁当与儒学的普遍推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随着儒学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学也就逐渐为大众所接受，更重要的是，掌握儒学经典成了国家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这就使得更多的人注重对儒学经典的研究。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儒生为国家所吸纳，他们也就更多地分布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当中，从事包括参议筹划和具体的行政事务的各项工作，这也势必造成儒生和文吏的更为广泛的结合。

3. 关于两汉个体儒生的个案研究

两汉儒生的个案研究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论著、论文层出不穷。其中，既有对儒生人物作出全面评价的研究，也有就儒生的思想、学术及其社会活动的某个侧面所进行的专题性研究。学者们关注度相对比较多的研究对象，西汉有贾谊、董仲舒、王莽等，东汉有王充、班固、王符、张衡、荀况等。

如以董仲舒的研究为例，从20世纪以来，专题论文就有近700篇，^② 各种综论性、专论性及评传性专著就有10余部。^③ “综论性专著指不限于董氏思想自身，往往将董氏研究置于某种相关研究的关联中的著作，如：李威熊著《董仲舒与西汉学术》，黄朴民著《天人合一——董仲舒与汉代儒学思想》，曾振宇、范学辉《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等。专论性专著是指专就董氏思想进行研究的著作，如：周桂钿著《董学探微》、杨鹤皋著《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张鸣岐著《董仲舒教育思想初

① 阎步克：《关于儒生——文吏研究的说明》，《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2期。

② 据张传玺先生《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续编》、《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1992年、2002年）及CNKI（中国知网）学术论文检索系统统计。

③ 据张传玺先生《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续编》、《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002年）及崔涛《董仲舒政治哲学发微》（浙江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王启发《近十年来中国大陆两汉儒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和最新进展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2期）。

探》、华友根著《董仲舒思想研究》、赖庆鸿著《董仲舒政治思想之研究》、戴莹《董仲舒对各家思想的吸收和改造》等。近年还出版了不少董仲舒的评传，如周桂钿、吴锋著《董仲舒》、王永祥著《董仲舒评传》等。”^①无疑，董仲舒一直是学界广泛讨论的儒生之一。董仲舒在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以及思想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以上的研究也多集中于从学术史和政治思想史等角度展开对董仲舒的探讨。其他如贾谊、王充、张衡等人则因其在文学、政治思想以及史学等方面的造诣而为后世论者所推重，他们的作品也因此而能为后世所传承。正因为他们的作品流传后世，他们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也能为后世较为完整地了解。自然，这些汉代的儒生也借着其流传后世的作品而为后人广泛关注和研究。

综上所述，许多相关著作不是从谈儒学、谈政治的角度涉及儒生的，就是将儒生群体中的个体如董仲舒、刘歆、王充等作为研究对象，而将汉代儒生这一群体视为一个特定研究对象的成果并不多见。即使是以儒生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其所论皆各有所倚，大多重在探讨政治、学术层面上的儒生问题，对于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儒生则基本没有论及。因此，从汉代儒生的观察视角来看，都难称全面。

三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儒生作为儒家思想的承载者而存在，他们以儒学修养作为共同身份标志，是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儒生群体内部通过经术传承形成不同流派，儒生个体也具有不同的身份背景，社会地位和职业活动，可以说涉及汉代社会上自皇室、朝官，下至胥吏、庶民等各个阶层。

本书着眼于儒生群体及汉代社会的历史视野，将研究的视点定格为汉代儒生的社会活动。拟采用历时性研究方法，从缕述儒生的渊源入手，勾画出汉代儒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轨迹；与此同时，也在分类描述的基础上，对儒生群体的整体特征及其在政治、经济、礼制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活动进行具体剖析，力求能够将儒生的社会活动置于两汉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系统考察，并就两汉儒生群体的社会贡献和地位问题，作出切近事实的阐释。

^① 崔涛：《董仲舒政治哲学发微》，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第5页。

本书对汉代儒生社会活动问题的考察，在学科性质上属于历史学的社会史研究。所赖以立论的材料，主要是与两汉社会及儒生群体相关的传世文献、考古学资料和学界的研究成果。基本的逻辑方法，是归纳法和定性分析。在理论观点上，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同时也借鉴社会学的网络结构和社会分层的阐释模式。在研究过程中，本书也力求做到对儒生群体属性的分析与个体儒生的个案研究的有机结合。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1
第一章 两汉儒生的历史渊源	1
第一节 先秦的儒生	1
一 儒的起源	1
二 早期儒生的主要特点	3
第二节 秦朝的儒生	8
一 “一任于法”的统治思想下儒生的社会地位与作用	9
二 秦末的社会动荡与儒生的际遇	13
第二章 两汉儒生的分类	15
第一节 汉代人对儒生的分类	15
一 董仲舒、何休与应劭对儒生的分类	16
二 王充的儒生分类	19
三 其他具有儒生分类性质的叙述	21
第二节 今人关于两汉儒生分类问题的阐述	22
第三节 本书关于汉代儒生分类问题的基本看法	24
第三章 两汉儒生群体社会角色的构成及变化	28
第一节 儒生群体社会角色的构成情况	28
一 在学的儒生	28

二	事教的儒生	35
三	从政的儒生	42
四	隐逸的儒生	43
第二节	两汉儒生群体总量变化的阶段性特点	51
一	汉初的儒生群体	52
二	武帝至新莽时期儒生群体	55
三	东汉时期儒生群体	58
四	汉代儒生群体的来源	61
第三节	两汉儒生地域分布的一般特征	66
一	两汉儒生地域分布特征形成的历史条件	66
二	两汉儒生地域分布的特征	68
第四章	儒生与两汉政治统治	72
第一节	建言议政	72
一	汉初儒生安定国家的建言	77
二	武帝时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策	78
三	西汉后期儒臣应对社会危机的主张	81
四	东汉儒生反宦官的“清议”	82
五	儒生担任议政的主要职官	85
第二节	参与行政管理	97
一	儒生出任地方长吏	97
二	儒生仕朝入拜卿相	118
第三节	儒生在西汉统治集团内从边缘到核心的地位变化	128
一	汉初儒生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	128
二	武宣时期从边缘到核心的过渡	129
三	元帝以后儒生主导地位的确立	130
第五章	儒生与两汉社会经济	136
第一节	参与国家经济政策的议定	136

一	西汉时期儒生的经济政策之议	137
二	新莽时期王莽的经济改革	147
三	东汉时期儒生有关经济的建言	150
第二节	从事经济事务管理	152
一	儒官参与国家的经济管理	153
二	儒吏从事地方的经济管理事务	154
第三节	经营生计活动	158
一	西汉儒生的生计活动	160
二	东汉儒生的生计活动	165
第六章	儒生与两汉礼制建设	169
第一节	儒生与汉初至宣帝时期礼制的建立	169
一	叔孙通制朝仪、宗庙礼	169
二	文景时期儒生对礼制建设的建言与贡献	178
三	武帝至宣帝时期礼仪活动中的儒生	180
第二节	元帝到新莽时期的礼制变革	185
一	元帝至西汉末儒生主导的礼制变革	186
二	王莽新朝礼制	196
第三节	儒生与东汉时期的礼制完善	200
一	光武帝时期的礼制创建	200
二	汉明帝时期的礼制建设	208
三	章帝以后的礼制建设	213
第七章	儒生与两汉文化教育	217
第一节	儒生的经学传承活动	217
一	两汉儒生传经的学术源流	218
二	两汉儒生经学传承的具体方式	230
三	儒生经学传承活动的特点	232